

2704



D663.4
08

晋 安

2

普安文史资料

第二辑

1986.11/16

中国人民政协普安县委员会
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主 编：王 度

责任编辑：卢昌隆
曾丰成

封面设计：杨 新

贵阳黔灵印刷厂印制

《普安文史资料 第二辑》

目 录

张立同志事略.....	黄体贤 (1)
回忆普安抗日救亡运动.....	肖维亮 (19)
我和张老板相处的日子.....	徐惠文 (31)
缅怀先兄张立在普安的革命活动片断.....	张继良供稿 曾丰成整理 (37)
谭本良先生生平事迹.....	曾丰成整理 (43)
回顾谭本良夫妇支持地下斗争和解放西南的 贡献.....	黄体贤 (49)
过“松岩古刹”随感(诗).....	姚元炳 (58)
陈亮卿事略.....	卢昌隆整理 (59)
易荣黔事略.....	陈可云 (66)
普安县参议会概况.....	陈可云 (73)
我经历的台儿庄战役片断.....	桂 灿 (79)
西南联大过普安.....	卢昌隆 (89)
民国至解放历届县长名单.....	孙连安 (93)
国民党普安县党部概况.....	曾丰成整理 (95)
易仲山覆灭记.....	卢昌隆整理 (100)

张立同志事略

黄体贤

贵州普安，原属盘州厅管，前清设县，归兴义府，民国建制属兴仁行署辖区。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张立同志出生在这个县城内东街肖家巷。乳名瑞昌、书名继香，字芳，别号又铭，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时期、为避免敌特注视，经常更换姓名，曾用张志澄、芳姐，于春山，陈荣生、高扬等化名。张立这个名字是他在入党时取的，解放后，组织公开才使用。

张立的祖父名世泰，前清进士，在普安县设馆讲学，执教一生，清风两袖，刚直公正，博得当地人的好评。张立的父亲名敷治，从小受其父教育，海读旧学，因废科举而未外出求学，在本县任过“粮书员”，后因患头风病辞职，闲居家中治病，家境日益萧然。一九二〇年病故，终年六十七岁。张立的母亲高氏，为人贤淑，勤俭持家，抚育子女，操劳家务，年老病故。现在尚有亲堂叔二人，四叔名敷荣，早年留学美国，为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现为中共党员，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国务院学部委员会委员，西南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六叔张敷铭年逾花甲现住普安休养。张立有兄弟二人，胞兄张祥，早年在黔军任营长时在清剿土匪中冲锋陷阵，不幸以身殉职。

90 / 50928

1

张立同志少年时代在其祖父和父亲的直接教育下，念过一些古书，奠定了他的汉语基础。其后读过小学，智力敏锐，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小时即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本城吴氏女结婚，生一小孩，因病夭折，吴氏亦相继病故。其后张立与邻居任泽英相爱，任原由家长包办和本城刘姓订有婚约，因非自愿而反感，于是他们结伴出走，中途被刘姓截住撕打，官府只作劝解，禁止打闹，旋告了结。一九三一年张立再度离家赴筑，自谋生计。不久，任泽英亦跟着到贵阳，后考入达德中学读书，两人仍坚持相爱，遂订终身之盟。张立因生活所迫，适逢同乡原系他祖父的学生谭本良时任黔军第十师团长，函遂他前往湖北通城任团部军需之职，开始戎马生涯。一九三三年任泽英由达德中学毕业后，即往湖北几经辗转于长沙与张立结婚，两人志同道合、互相励志，结成了战斗伴侣。

自一九三二年开始，张立同志就与中共地下党员刘雪苇结识，研究马克思学说，探索革命征途，逐渐成为挚友。刘雪苇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经费困难，张立就从湖北寄钱支持。一九三五年刘雪苇派到贵阳和秦天真等组织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刘雪苇任委员。贵阳“7.19”事件，刘不幸被捕，八月、刘在狱中说通看守所连长共同出逃，才得脱险。

一九三五年，张立所在的黔军八十五师在湖北通城与贺龙将军率领的部队在板栗园之战，黔军大败，师长谢彬阵亡。这时张立在谭团任军需，目睹红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实为中国人民所钦佩和爱戴的部队。张立等人在前线阵地又拾得红军一些宣传文件阅读，更加明确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为推翻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解放人民的疾苦而战；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战，从此他衷心信赖和拥护红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他毅然离开该部返回贵州和刘雪苇、秦天真等进行革命活动，自湖北首途，行抵重庆，获悉刘雪苇在筑被捕入狱，他因不便回贵州，暂住重庆。不久，突然接到刘雪苇越狱成功的信，并已潜往上海，函邀张立去南京会晤。张立喜出望外，立即启程，张立与刘雪苇劫后相逢，分外亲切，两人商议决定在南京开设书店作为革命活动的联络据点，适值谭本良已离开黔军奉调至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他妻子邓元卿也随同来到南京，她在张立的影响下，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听到张立说要与刘雪苇等开设书店，她很赞成，私自拿出资金相助，张立邀集友人物色铺面，一切安排就绪后，定名为“平平书店”，张立任经理，还邀约进步人士王涛、张鸣正、关伯庸、徐惠文等作店员，经理俗称“老板”，后来“老板”便成了他的外号了。此后、张立就以平平书店老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暗中和刘雪苇、秦天真等地下党员秘密联系，从事革命活动，竭尽全力为党筹集活动经费，解决一批同志的实际问题。记得秦天真要由上海返回贵阳开展革命工作，川资拮据，张立即从书店汇款至上海交刘雪苇转交秦天真同志，开设书店的另一个目的是经营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张立及其同事们还经常向广大读者介绍推荐激励人们上进的书籍刊物、常说：“读书要和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读书不忘爱国”。为广泛团结进步人士，扩大党的影响，张立还随时寄给他在贵阳男师读书的堂弟张继良一些进步书刊，并由张转给其他同学阅读。当时张继良也秘密

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组织“读书会”“民族解放先锋队”活动。实际上张立经营的“平平书店”原是秦天真、刘雪苇筹划设立在南京的地下联络据点。与此同时，张立还在南京创办《半月观察》自己亲自撰稿发表大量进步文章。书店开业一年多，对地下革命活动发挥了显著作用。由于书店经营的多系进步书刊，业务也逐渐发展扩大，因而引起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注目，猜忌、跟踪、盯梢。不久，书店被南京警备司令部查封，并将书店的经理张立及其同事人员全部拘捕。谭本良闻讯后，立即去找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营救。张与谭系少年时代在盘县南台小学同学，多年来一直相处甚好，老友深情，慨然相助。这时张立的妻子任泽英也在南京多方请托贵州在京同乡说情。事也凑巧，就在此时突然爆发了芦沟桥事件，举国上下反日情绪沸腾，一致要求蒋介石释放“政治犯”、响应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号召。所以张立等人很快于八月初即由谭本良具保释放。经过两月多的铁窗生活，他坚贞不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使他更看穿了蒋介石独裁专横，黑暗的统治，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暴行，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后来在刘雪苇、秦天真的鼓励帮助下，又得到谭本良，邓元卿的经济支援，跋山涉水，冲破重重关卡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革命理论知识，亲聆革命领袖以及许多革命前辈的亲切教导，体验革命圣地延安团结紧张、艰苦朴素的生活，确立了他光明磊落，刚直无私，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品德。他曾多次以此教诲于我，至今思之，言犹在耳，感人至深。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委员秦天真同志奉党中央指派从延安重返贵州工作。五月，张立由陕

北公学院毕业后也从延安奉调回黔，在秦天真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由于秦天真和张立早有交往相识已久，秦对张的思想、工作、品质以及家庭情况早有了解。当张立在七月份提出入党申请时，秦认为张立多年参加地下斗争，立场坚定，并经过考验符合党员条件，故亲自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报经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批准，实现他多年梦寐以求入党的夙愿。当时正是贵阳“2.19”学联代表李德邦、周树楹、饶永祈、于蕻、方为策、聂琦慧、王斌等七人和“2、21”事件原省工委黄大陆、李策、严更生等三人先后被捕之后，其中六人得以释放、尚有黄大陆等四人在押，正在设法营救之中。在这连续发生两起事故之后，贵州地下党组织遭到惨重损失。然而贵州反动当局气焰还很嚣张，必须提高警惕。省工委为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预防再出事故，拟转移一批同志。指派张立、田伯萍先后到达滇黔公路沿线的普安开展革命工作。省工委要求他们要利用社会关系与熟悉地方情况的特点，采取用合法身份，掩护革命活动，争取劳动者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包括旧式军阀易晓岚之子易晋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根据地作准备。建立一个隐蔽基地，以备将来各地暴露身份的同志得以安全转移。张立、田伯萍到普安后，适逢八十五师旅长、张立的挚友谭本良回乡探亲。普安地方知名人士和当地县长等轮流请谭赴宴，而谭每次都偕同张立出席，张籍此广交朋友，以利开展革命活动。工委指示，要在普安开办一些实业，不仅可为以后陆续到来的同志提供职业掩护，而且还可为革命筹集必需的经费。张立便与易晋侯等商议首先在半坡塘开办一个铁厂。不久，张又动员陈亮卿，

易晋侯、徐光楷发起认股集资的方式，在县城开办裕民染织布厂。接着又在梅花箐建立一个纸厂。省工委将外地和贵阳已暴露身份的同志陆续转移到普安来安置隐蔽。如田伯萍安置在裕民染织布厂任管理总干事，肖维亮安置在城关小学任教，张人均安置在纸厂任经理，张立本人则任铁厂经理，储兆农做交通工作，雷光远做驾驶员，周兢辉任盘水小学校长，徐惠文任盘小教员。还有苏、熊、邵等四个同志则由张继良同志分别安置在民教馆和盘水小学任教。裕民染织布厂建立后，生产很顺利，获得的利润从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作为职员的报酬。如张人均同志在普安纸厂几个月因工作需要调到晴隆时，还发给五十元作为路费。上述几个工厂作为普安地下党组织活动的基地。与此同时，张立对普安县民众教育馆做了大量的工作。要使宣传工作符合党的政策，订阅了《新华日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介绍新四军、八路军抗日的英勇事迹。阐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值此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号召大家要有勇于献身精神，不当亡国奴。民教馆还组织演话剧、歌咏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张立同志曾亲自带队到青山、地瓜、兴中等地演出。每逢普安场天组织进步青年上街宣传演出，激发人们的爱国抗日热情。

凡是组织上转移到普安的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张立都负责安置了工作，以公开的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革命工作。当时环境虽然相当艰苦，但同志们都奋以忘忧，心情愉快。地下党组织注意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内部分工是：田伯萍负责全面工作，肖维亮负责组织，张立担任传达和统

战工作。对外有的称店员，有的称经理，会计，教师等。除了党内按规定进行单线联系，外面一切接洽事务则由张立出面交涉。他以本地爱国人士和企业经理身份，热心为桑梓服务，在普安城乡宣传抗日救亡，唤醒民众抗日。广泛团结进步力量，组织上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激励群众热情的基础上、发起为前线抗日将士搞募捐活动。当时普安许多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对日寇侵犯祖国领土义愤填膺，纷纷踊跃捐献，支援前方将士抗战到底的决心。其中捐献金额较多的，记得有邓元卿、张继良、易晋侯、陈亮卿、徐光楷等人。与张立同志关系较好、思想进步的县教育科长张凤鸣也慷慨解囊，支援募捐。这些募捐款项，大部份汇给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这次募捐活动，充分体现了普安各界人士关心国家民族存亡的爱国热情。由于张立同志家在普安是世代书香门第，颇有声望，社会关系较好。所以地下党组织在普安开展工作顺利，疏散隐蔽来的同志没有出现问题。这批同志后来战斗在省内外的各条战线上，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〇年省工委传达了党中央对白区地下工作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普安地下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更加注意斗争策略，谨慎从事。一九四一年一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贵州形势恶化，普安也紧张起来。一天晚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黄龙渭去找县长车祖瑜派警察去逮捕张立。车祖瑜知道张在普安是上层门第，与该县大绅士陈亮卿、易晋侯、谭本良等交情甚好。平日张立与车祖瑜也有往来，并无恶感。车祖瑜很清楚要想在普安扎根坐稳，决不

能与张立交恶，所以落得卖个人情，理直气壮的问黄龙渭：

“有没有上面指令？”、黄答：“没有？”车又问：“有没有抓到确凿的的共产党证据？”黄答：“没有”。车说：

“龙渭兄，一没有上级指令，二没有确凿的证据，随随便便去抓人是要犯法的，而且你知道、张芳在普安是有声望的人，惹出事来别说我这个小小县官顶不住，连你书记长也担当不起，恐难以从命，请兄三思而行”。就这样把黄龙渭顶回去了。黄为此恼羞成怒，回去命他的科长颜仿秋拟文报请省党部下令逮捕张立。颜仿秋不敢抗命。颜与张芳家同住本城，张家在普安又有名望，颜心里想着连车祖瑜都不愿担过，我又何必为虎作伥，为黄龙渭火中取栗！便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奉命照办拟文呈报；同时又向易震东透露消息。易即时托徐光楷通知张立转移到梅花馨他家中隐蔽。这时党组织也得到省工委通知，“情况紧急，即时转移”。张立化装成农民，并由易晋候派人陪同走小路，过茅口河辗转到贵阳，找到省工委由杜守敦同志代表组织安排他转移到重庆。他持组织介绍信找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由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龙潜接见，把张的组织关系转到《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直接领导，派他任重庆市中苏友好协会干事，兼重庆《新民报》资料室主任。张利用职务之便，撰写了许多有青春活力、有革命气魄的战斗檄文，鼓励和教育广大青年为拯救满目疮痍的危难祖国、奋励不懈。张立离开普安后，其他地下党的同志肖维亮，雷光远转移到昆明。

一九四五年八月组织上派张立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并经组织批准张立同志的爱人任泽英也由普安到重庆和他一道去苏区工作。当时鄂豫皖苏区战争频繁，生活坚苦，任泽英同

志历尽艰辛，以苦为荣，战斗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不幸在大别山英勇牺牲。张立同志失去了革命的战友、患难与共的伴侣。这个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限的悲伤。

鄂豫皖边区改为中原解放区后，组织上派张立去进民主大学深造。一九四六年五月张立奉命随部队在中原宣化店突围，仍回四川做地下工作。张到重庆，即到吴玉章同志处报到，经组织决定由何其芳同志领导他的工作，派他担任《大众文化社》领导成员，《活路》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张立以锐利的笔锋撰写文章抨击国民党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专政的黑暗统治。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抗，悍然撕毁国共两党谈判的停战协定，突然袭击查封中共谈判代表团重庆驻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三个公开机关的工作人员强行送回延安。张立没有暴露身份，又有社会职业掩护，故未被送走。当时地下党组织考虑安全起见，一般采取单线联系。张立的直接领导人何其芳同志是被突然强行送走的，来不及通知张立。因此，张立与党组织中断了组织关系，甚感苦闷彷徨。人海茫茫，何处去找党呢？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跋山涉水、千里奔波去找他在《大众文化社》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共过事的战友宋学芬、黄又凡、黄秋帆等秘密联系，筹划去大巴山一带组织游击队，他为此专程去成都找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李荫凡协商，因有种种困难，不能如愿。遂于十月返回重庆与宋学芬等再度商议，利用家乡地方熟悉优势，并与在渝贵州同乡先仲虞等研究，决定在黔东南一带组织农村武装斗

争。竟出乎意外的与川东特委负责搞武装的尚泽宽取得联系。张立托尚向上级党找何其芳清理他的组织关系，后来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并将张立的组织关系转到川东特委领导。一九四七年七月张立找到滕久荣、先仲虞赋予他们一项重大使命，动员一批在渝的学生骨干先行回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黔北特委成立，张立任书记，宋至平任副书记。接着张立、宋至平先后到达德江，选择以德江、松桃、印江一带的梵净山连绵百里，峰峦叠嶂山区为基地，开展武装斗争。经川东特委批准，组成黔北游击纵队，张立任司令员，宋至平任副司令员兼政委，下设五个支队，先仲虞，周知群，董啸眉，张春涛，滕久光，滕从戎，田家乐，张嗣麟，石锦~~麟~~分别担任支队长和政委。滕久荣留纵队协助工作。这支游击队在黔北特委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解放后，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后改为黔东北纵队。

一九四八年秋，川东党委负责人邓兆明通知张立，上级决定：川东党领导的黔北特委工作改由中共华南局领导，要张立去香港找组织接头，汇报研究工作。张立问明接头地点、暗号方式等情况，正要准备启程，何松涛深夜从抗战堂跑到公园路找邓元卿说：情况十分紧急，要张立即时转移。在此紧急关头，邓元卿毫不犹豫地冒着风险派她的侄儿持重庆市警备司令部通行证，护送张立上船，安全离渝、转沪、抵港。

一九四九年二月，张立向中共南方局汇报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华南局钱瑛同志代表党组织决定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张立、刘鎔铸、蔡云诚（未到职）组成，张

立任书记，并拨给工委活动经费，用港币折合金元券汇交重庆公园路一号常春芳（即邓元卿的化名）收。邓元卿收到汇款后交给中共地下党员张人均去办理，那时金元券贬值，一日数跌，等到张人均去取来数十万元时，几乎变成了废纸。此后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全由张立同志设法解决。那时有公开社会职业能领取薪金的、或者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同志，不但自理活动经费，还要帮助解决经济拮据的同志，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同志除尽量节衣缩食，有时出差找便车，找亲友处食住。这样既能节省开支，还能避免敌人盘查，确保安全。

一九四九年二月，张立同志由香港奉派回贵阳，适逢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先期调来贵州担任省长，兼保安司令，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社会局势突然变得很紧张。谷氏不愧为“屠夫”的称号，对贵州人民进行疯狂反扑。张立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环境这样恶劣，经济又很困难。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抓进监狱惨遭杀害。当时作为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的张立，年仅三十九岁，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他只身来到贵阳，处在那样的艰难困境，身负党的重托，领导全省地下斗争，工作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呢？首先要解决的是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作为省工委的办公地点，他多方探索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张立与我商量，便选定我家作为省工委的办公地点。因我那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中级军官，有些上层社会关系，不为人所注意。我爱人郭诗昭抗日战争开始就在贵阳女师参加党的地下活动，一直坚持革命斗争。我母亲一九三五年在家乡亲眼看到红军为穷苦老百姓谋翻身解放的革命军队。她热爱红军，所以让他的侄儿金大方

参加红军长征，从此便和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的弟妹们也很懂事，还可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加上我所住的花香路是在城外地处偏僻，又是一楼一底的独立房屋，与左邻右舍不发生关系。母亲为了保密起见，主动辞退了婢姆，还把比较隐蔽、容易遮掩的一间楼房腾出来给党组织使用。此后这间楼房乃成为省工委的办公室，秘密印刷所，会议室，指导全省地下工作的战斗司令部。而且从始至终保持安全，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事故。

一九四九年祖国大地风雷激荡，国民党反动统治风雨飘摇。但敌人仍在垂死挣扎。三月初，我从保安司令部探得的消息：黔北游击纵队遭受敌人袭击；郎岱“三、三”暴动失败；贵阳加紧封锁我前方捷报，蒙蔽人民；对地下党搜捕杀害时有发生，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张立同志毫不畏惧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针锋相对的进行斗争。自己亲写文件，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劣迹，群情激愤，反蒋浪潮日益高涨。贵阳市大中学校反饥饿罢课游行示威，更加声势浩大。我们通过发文件，传单、刊物等宣传党的政策，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号召广大群众保护国家财产。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政策向人民群众宣传，给反动当局迎头痛击。我又从敌营内部收集了一些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资料，由张立亲笔撰写了《告贵州人民书》《不要再糊涂了》两篇文告，都用“贵州省人民解放委员会”名称落款。宋学芬、郭诗昭刻写腊纸、油印、装订成册，秘密利用我当时所在的国民党第六编练司令部贵州招考处人事组的油印机大量印发，发至全省各地。有的张贴在大街的墙壁上，有的贴在交通路口要道的醒

目地方。贵阳市民争相围观，喜形于色。这些文告，贵州人民有的至今还保留着。张立同志不顾疲劳，亲自率领黄体济、黄运明、黄体揆、郭诗韵等站岗放哨，投递信件，埋头苦干，任劳任怨，通宵达旦地工作，至今，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印发了“中共贵州省工委”的第一、二号文告，揭露反动当局的种种罪行，号召全省人民起来斗争，迎接贵州早日解放。

几天以后，贵阳市气氛热烈、街头巷尾，茶楼酒店，人们都在悄悄地议论着共产党在前方打了大胜仗，说是要来解放大西南、宣传文件都印发出来了。各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反响：那些官僚资本家们惊慌失措，纷纷准备外逃。市场黄金、白银价格暴涨，银元券大大贬值、房地产猛跌。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和教职员工及广大市民盼望早日解放，受到很大鼓舞。总的情况反映了这两篇文告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接着，张立决定创办中共贵州省工委党刊《真实》，宣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最初翻印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由于党内文件十分缺乏，后来我想起国民党印发过《共匪文件汇编》其中全是翻印我们党内文件的原文。我到保安司令部找郭礼堂设法借来两册。以后我们翻印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都是在那里抄下来的。但其中唯独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所以我们当时印发的团章是张立同志参照党章内容编写的并在前言中注明，为了工作急需，由工委决定临时的团章暂行草案，待以后得到正式团章时即行更正。

张立同志忙于领导全省地下工作的繁重任务，上级党委